

27.10/

9/

新城文史資料

第九輯



71000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西安市新城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新城文史资料

第九辑

封面题字：官葆诚

封面设计：方 胜

责任编辑：王好哲

校 对：郝旭阳

王好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西安市新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月

目 录

西京招待所始末·····	俞承淦	(1)
白敬宇药厂西安分行概述·····	赵和卿	(16)
华兴厚铁工厂旧事·····	王永久	(26)
宝华银楼致胜之道·····	王法古	(37)
大丰酱园的创建与归宿·····	屠伦长	(43)
利民米厂变迁·····	何安辰	(55)
抗战期间西安织布业拾零·····	李文斌	(66)
百乐饭店兴衰·····	马建中	(70)
昔日炭市街·····	葛晋卿	(74)
张自强与炭市街·····	马建中	(77)
炭市街副食品市场新貌 ·····炭市街市管所供稿		(83)
泰华呢绒绸布商店·····	许学礼	(87)
黄河棉织厂公私合营前后·····	杜峻峰	(103)
西安汽车配件厂初期十年·····	傅武成	(123)
从新生工厂到东风综合厂·····	李文斌	(134)

炉渣内燃粘土砖新工艺纪事…范鼎新 (139)
 八十自述……………段晓天 (145)
 王宗山怒斥调统室……………马建中 (178)
 蒋纬国的宗教婚仪……………葛晋卿 (180)

补白七则:

八府庄 (36) 集贤巷与吉庆巷 (73)
 三府湾和三府湾新村 (82) 操场巷与
 草场巷 (133) 红十字会巷 (138)
 西安也有一马路 (177) 西安 “二府
 庄” 知多少 (182) .

西京招待所始末

俞承淦

从火车站进入历史名城西安，南行约一千米，在解放路西四路口的西北隅，有一幢中间三层、两翼二层的西式楼房。早年，它的前面是一片草木郁郁、花卉葱葱的颇为幽雅的庭园。如今，庭园面目虽然迥异，但别致的建筑犹存昔日风韵，只是略感陈旧。楼前齐胸的一通碑石上，镌刻着闪烁历史光辉的几行大字：

“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安事变旧址 西京招待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公布

陕西省人民政府立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京招待所的全称叫中国旅行社西京招待所，是中国旅行社（以下简称中旅）的一个分

支机构。故叙述它的始末，还需得简略涉及中旅的情况。

中旅的前身是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五日开业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旅行部。以后，随着业务的扩展，上海银行拨给相当资金，才于一九二七年正式成立了中旅。它作为上海银行的一个分支机构，专门经营旅游业务，是中国近代旅游事业的创始。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经济落后，人民贫穷，不具备发展旅游事业的基本条件，故中旅成立数年，苦心经营，无利可图。上海银行为利用中旅作为它的先锋队和宣传队，借以博取社会舆论的好感，振兴信贷业务，便多方予以支持；中旅全体员工也筚路蓝缕，潜心探索，勤奋经营，业务遂有迅速发展。至抗日战争前夕，它在东部各省的大中城市及铁路干线的重要车站，都设有分支机构，成为国内一枝独秀的旅游企业，在海外也颇有声誉。

抗日战争期间，受时局影响，中旅所属机构变动很大，一些单位从硝烟迷漫中撤出，一些单位又在鼙鼓声里建立，其业务重点也逐步

地由东南沿海转移到抗日大后方。彼时，西南、西北各公路沿线，中旅遍设食宿站及招待所，其中大部分系受公路局委托所承办，为大后方抗日群众提供旅行服务。同期，它又在东南亚各国先后建立了约十处分支机构，既方便海外同胞从事抗日活动，又协助运送进出口的抗日物资。

抗战胜利后，中旅设于公路沿线的服务网点相继撤消，而战前机构却陆续恢复。解放战争期间，政局动荡，通货膨胀，旅客锐减，业务艰难，整个中旅陷入困境。解放后，一度受社会条件制约，中旅所有机构业务亦无起色，全赖上海银行资助维持。迨一九五二年金融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上海银行并入公私合营银行时，中国人民银行曾派宋、王两位处长深入中旅各分支机构调查研究。最后决定，于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全部停业。中旅这个经历了三十一年、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的综合性旅游企业，宣告结束。

一九三一年，南京政府提出开发西北的口号后，上海银行鉴于西安地处承东启西、联结

西北、西南的交通要冲，大有发展前途，遂于一九三三年筹设了西安分行；中旅亦同时设立西安分社。旋在尚仁路（今解放路）与崇信路（今东、西四路）什字购地十一亩许，积极创建招待所。因此前曾酝酿以西安为陪都，一度改西安为西京，故取名西京招待所。一九三四年底，陇海铁路营运至西安，更促进了中旅建设西京招待所的步伐。逾二年，耗资二十余万元，于一九三六年春正式建成，开张营业。

西京招待所中西合璧，庄雅有致，建筑面积三千余平方米，客房四十六套，备有卫生及暖气设备，中、西餐点及理发、洗衣、代客收发电报等服务项目也一应俱全。这在当时还十分空旷的尚仁路真可谓鹤立鸡群。它既与南院门的西京国货公司和北大街的通济大楼并称西安的三大现代建筑，又同南京首都饭店和南昌洪都招待所鼎足齐名，列为中旅的三个大型招待所。

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华东大片国土相继落于日寇之手，沦陷区爱国同胞络绎不绝地内迁至西南、西北，川陕、西兰两条公路便成

为国内的主要交通干线。西安是这两条公路的枢纽之地，故西京招待所常常旅客盈门，业务鼎盛。抗战后期，它一度被当局指定为招待盟军的处所，大部分客房住着美国的空军人员。

“八·一五”日寇投降，大量复员东往的军官从西安路过，客房亦颇紧张。稍后，局势甫定，东南各地特别是沪、苏、锡、常的厂商来陕采购棉花，群集西安，业务仍继畅不衰。

西京招待所从开业到解放，凡十三年，由于时局动荡，经济不稳，物价迭涨，法币贬值，故挣扎经营，颇为艰难，大体上仅勉能维持帐面上的基本平衡，或者略有盈余。但是，它严守中旅传统，优质服务，守法经营，盛行于一般旅店的烟、赌、娼等歪风邪气在此也从未发生，故获得了社会信誉和各方好评，其社会效益是无法以币值数字能够表达出来的。此外，招待所还有一笔帐面上不作反映的收益，那就是随着西安市面的日渐繁荣所带来的房地产增值。当年购地时，每亩只有百元左右，而抗战胜利后按纳税地价计算，每亩已高达万元，增值率达到百倍；如按实际市价计算，增

值率则更超此数。

西安解放前夕，西京招待所全体员工与上海银行、中旅系统其他单位的同仁一样，一般的都比较沉着稳定，并以期待之心情、探索之希望，准备迎接新的曙光。我们几个担任经、副理职务的人曾互相探讨议论，大体上有这样的共识：国民党贪污腐化，丧尽人心，看来大势已去；只有易弦更张，国家、民族才会有新的希望。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作风，大家虽然还朦胧不清，但对社会上流传的那种邪恶之言，我们则是绝不相信的。更由于我们隐约地听到过一些共产党公私兼顾、保护民族资本的政策，以及八路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传闻，故心情虽忐忑不安，但大趋势是心向往之，引领望之，企待解放，获求新生。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旬，临近解放，满城惶惶，旅客相继离去，西京招待所房间空空，业务停顿。旋悉胡宗南将不战而逃，我心头顿生真空时间治安失控，遍生抢劫破坏事件之惊。我们遂把积存的现款分散寄放到职工家中，并组织职工日夜轮班在所内守护，以防不

测。五月二十日上午，听说解放军已经进城，整个西安几乎未闻枪炮之声即平稳地度过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我紧张的心情才渐趋平静。

解放之初，旅客绝迹，门可罗雀，我对西京招待所的前景颇感困惑。一天上午，七八位身着灰装、赤脚草鞋的解放军突然驾临。我急急趋前接待。为首者气宇轩昂，健壮魁梧。他问：“这是什么机关？”我初虽瞠目，但迅速稳定情绪，心无所惧地告诉这是中旅所办的一个接待旅客的机构，叫西京招待所，不是什么机关。进而又自我介绍自己就是这里的经理。他慰勉说：“不要顾虑，好好做你的生意，情况是慢慢会好起来的。”随之着我带路，楼上楼下巡视一周离去。送他们走时，我问最后一位年轻一点的解放军，刚才同我谈话的那位是谁。他憨直地说：“你怎么连我们的贺老总都不认识？”我一下子愕然不知所措。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人民解放军的高级领导人，他粗犷质朴、平易近人、率直可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彭德怀将军也轻车简从地来到西京招待所。此前，我已从报纸上见到过他那威

而不怒的儒将仪容，故心绪坦然地陪着彭老总视察了全所。彭总边走边讲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谆谆教导我们积极经营，为人民服务。彭总的话言简意赅，发人深思，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恢复业务的信心。稍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贺廷俊、宋文梅两位处长前来联系接待任务，说西安亟需一个比较高级的宾馆接待外宾和一些高级人士，经反复考虑，只有西京招待所尚可适应这一需要，希望我们大力配合，共同完成接待任务。我传达了贺、宋的讲话之后，全所上下欢欣雀跃，随时准备接受任务。旋经委托，我们陆续接待了一系列大型会议。如一九五〇年元月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时，西北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大都住在西京招待所。此外，苏联、东欧、朝鲜等兄弟国家外宾来访，班禅大师和达赖喇嘛首次进京过秦，都是下榻于此。我们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完成了交际处先后下达的许多接待任务，受到了各级领导的称赞；全体员工也以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和人民的信任而引以为荣。

建所以来，我们的服务对象多为资产阶级

上层人士和国民党的达官贵人，故接待工作中习惯于论阔气，讲排场。解放了，服务对象迥然不同，我们一开始还有点不太适应。但是，全体员工谨遵一条宗旨：尊重顾客，热情服务。记得西安刚刚解放不久，我们接待了南下工作队一行几十个人，他们中间有些人对开关电灯和使用卫生设备等均不谙习，服务员们就不厌其烦地提醒和交代。背后免不了也有议论，但当面从未有过失礼之举。再如各种会议的伙食标准只是四菜（二荤二素）一汤；开始或结束时虽然会餐添菜，也只不过是增加两至四盘普通菜而已，而且还规定要从平时的伙食费中调剂出来，绝不允许另列开支。起初，我们颇觉共产党太小气，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才慢慢地认识到这是艰苦朴素的延安作风。从而，我们每每接待各种会议都是精打细算，尽可能地保证与会人员吃饱吃好。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之后，虽规定对会议略有贴补，但审批手续极为严格，报销亦颇麻烦。于是，职工们就想办法调剂饭菜花样，以副补主，节约粮食，力争不超定量标准。我们就是这样通过业务实践改

造思想，提高觉悟，改变经营作风。

与此同时，中旅西安分社于解放后不久就恢复了代售车票业务，并主动靠拢西北贸易部所属的西北人民运输公司（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接受国营企业的领导，公私合作承揽棉花运输。记得当时西北运输公司所承运的绝大部分货物，都是中旅利用过去老客户的业务关系而揽到手的。

中旅的经营作风一向公认是比较正派的，加之在长期的实践中他们又制订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营管理制度，所以解放后西京招待所按帐照章纳税，一九五〇年市税务局即认可对其按查帐稽征方式征税。由于招待所的业务比较简单，所以“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中，除了一些鸡毛蒜皮之事外，我交代不出什么问题。但是，西京招待所树大招风，我却被当作“大老虎”的重点怀疑对象，迟迟结不了案。当时，我理智上对“五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虽有所认识，但在情感上还是难予接受。经揭发检举，内查外调，三

番五次地折腾，工作组才宣布我们为基本守法户。

“五反”运动之后，业务一度不振。幸省政府交际处接待任务频繁，派员前来商谈，包租全部房间一年，业务始得复苏。翌年，交际处又表示欲购买西京招待所。为此，我专程去了一趟上海，请示中旅。缘上海银行已经合营，总社又无权决定可否出售，只好作罢。旋因人民大厦落成，招待所内住的苏联专家全迁过去，省交际处遂退还了包租的房间，我们又开始自找接待任务。

上海解放以后，中旅工会曾多次与上海银行进行了劳资协商，终于争得员工工资待遇的调整。记得一九五一年时，按折实单位发薪，西京招待所服务员月工资是一百万元左右，职员一百五十万元左右，我拿到二百万出头一点，这在西安当时是少有的。闲谈中有人询及自己收入时，我每每含糊其词，不敢实言。但由于接待任务极不稳定，有时甚至出现亏损，所以资金周转困难，工资难按标准照发。经所内协商，只得临时视当月收入情况，折扣发薪。

“五反”运动开始，我深恐职工不谅，便急电请总社接济，发清了积欠的所有工资。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金融业改造，上海银行并入公私合营银行，适当地降低了员工工资。而中旅由于安排待定，故工资仍居高难下。此时，银行既不能如过去那样给予中旅无限支持，中旅本身也无力承担高额支出，一九五三年后的一段时间，西京招待所还是折扣发薪。直至中旅结束时，才如数补清了积欠的工资。这一期间，西京招待所同仁殷切盼望国家早日对中旅作出安排，而总社却多次传来消息：人民银行正作研究。大家只好引领以待。

一九五四年六月底，总社电报指示：七月一日起停止营业。旋又接到有关清理、结束工作的书面通知。我持电报、函件去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市分行请示；时他们亦已接到总行有关中旅结束的通知。市分行即派业务科董建侯副科长等三人组成工作组，负责办理西京招待所结束事宜。他们责成我具体负责按总社的规定清理财产，并向全所职工宣布：所有职工由政府包下来，量才予以适当安置。因此，全所上

下情绪稳定，各负其责地清理财物，听候组织分配。

在市人民银行的领导下，西京招待所的清产、结束工作进展得极为顺利。

一、清理帐务，将历年旧帐册、传票等档案资料，造册装箱，运交上海总社。

二、清点财产，造册登记。

三、对房间装饰、家具用品，连同庭园中的树木，巨细无遗地进行估价。这项工作做得相当认真，如房间装饰及水暖设备等，均请建筑公司协助估价，力争公平合理。全部财产作价，总计三十万元，由政府出资购买。款项由市人民银行划转中旅总社。

四、妥善安置了员工。当时，中旅西安分社及西京招待所共有职工三十七人，其中有四人年老多病或欲返回原籍，自愿退职，组织上按规定发给了其六个月工资的遣散费；四人安排到铁路局工作；三人分配到市人民银行；其余二十多人均留在新组建的西安招待所，而且由人行工作组重新给他们评定了工资。考虑到原有基础，各人新定的工资等级均分别略高于